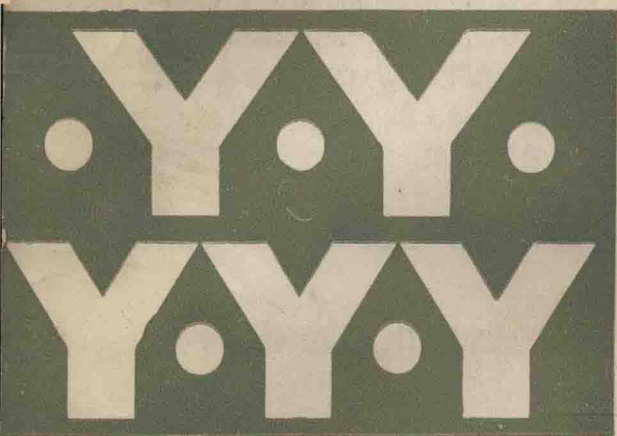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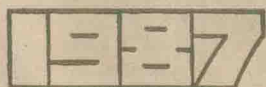
语言



学

研究

第 2 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语言学研究 (2)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李 臻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4 印张 102 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0172-7/H·2

(书号 9201·25) 定价 1.15元

[内部发行]

一個華語教學者的自述

何景賢

白話大師胡適之先生生前，常鼓勵人中年以後寫回憶錄，他的用意想必是認為：一個人的生活經歷無論如何微小，對於進展不停的時代與社會而言，終必有些可鑑取的意義與價值。

今（民國七十五）年，是我個人參與中華語文研究所（原臺北語文學院，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 簡稱 TLI）工作的三十週年。朋友們除惠予諒誼外，也極力鼓勵我寫篇回顧性的文字，讓大家知道何景賢其人與中華語言研習所這些年來究竟做了些什麼？我雖也是年過知命的「老青年」，自問却無什麼光輝的人生業績可言，不過投身華語教學行列近三分之一世紀的一點親身體驗，對於有志從事這項文化教育工作的青年朋友，總也許還有着可資參考的愚者一得，因此也就不揣淺陋的來談談自己了。

一、北平話——內容最豐富，聲音最優美的語言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陰曆十一月二十

九日，我出生在廣州一個屬粵語系的中國家庭裏，父親何健民先生原籍臺灣省嘉義新港，是為反抗日本統治而回歸祖國的留日知識青年。母親高寶鏞女士，為廣東香山（中山縣）世族，與父親相識於留學地東京，結褵於羊城。我是這個家庭的第二個孩子，也是長子。在我四歲的時候（民國二十七年），因先君奉業師朱嗣先（家驊）先生（先君由日返國後，在中山大學經濟系完成大學教育，時嗣先先生為中山大學校長）之命前往北京大學任教，藉臺灣身份相機作故都淪陷後的教育維護工作，而舉家遷往北平定居，使得我自上幼稚園起，就接受最道地、最標準的國語教育，也使我從此在北平話的世界裏，生根不移。我不知道是否人人像我一樣，確認北平話——中華民國的國語，是世界上最豐富、聲音最優美的語言，但可以斷言，任何一個曾和我一樣，在「北平話」的生活世界裏，完成童年教育的人，絕不能不以「北平話」作他真正的母語，或放棄說「國語」。這點我們也可以由無論任何省籍，

凡在北平受過中上教育者，大都能說一口標準的「國語」得到證明。像文壇前輩、原籍臺灣省苗栗頭份的林海音女士所說字正腔圓的北平話，就是最眼前的實例。

「北平話」之所以能成為所有人（包括世界上一切人種）都接受的中華民國的「國語」，主因是：在十億中國人民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操以「北平話」為基準的北方官話，而北平一地，自遼、金、元、明、清，以至民國，作為各方薈聚的大都會，幾達千年之久；而北平方言也就自然的被全國各地百姓們，相互運用成表達意思的工具。此外，不僅它的聲調優美、吐字清晰、傳意明確，更令人神往的是，北平話能完全自然地蘊藉着中國文化優美的精神內涵——禮貌、溫婉、親切、真誠，以及其他語言難有的藝術表達功能。雖然我在北平只待到十三歲，但北平話生活世界的一切——風土人情、社會狀態、教育環境、道德觀念、文化水準，却留給我深不可移的影響，決定了我一生為人處世的原則。離開北平

後，有幸在成年作過數度環球性的遊學，到達不少國家，迄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過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的社會服務、待人接物（尤其是商業店員）能像北平一樣的普遍溫和有禮（至少是我在那個時候）。我始終以為：只有北平話的生活世界，才能使中國真正無愧為禮義之邦。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我隨父母回到因抗日戰爭勝利而光復的故鄉臺灣，在和平中學（即今之師大附中），開始我的中學生活。當時，全校只有學生一百餘人，全係大陸遷臺的公教人員子弟，大家說着各省腔調的「國語」，却都不諳閩南語或客家話，使我毫無機會學習「鄉音」。高中時，我讀的是省立桃園農校，這是一個和師大附中全然不同的生活天地，同班同學幾乎全為來自北、新、桃三縣的農家子弟，大都操閩南語或客家話，應該是我「尋根」、學舌的最佳時機；但當時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我這個來自北平、一口標準國語的正宗臺灣青年，就在「時勢造英雄」之下，頓時成為全校的「鋒頭人物」，無論演講比賽、全縣中學校辯論比賽、各種集會的大會主席、模範團員、桃縣優秀青年表揚等，自然都落在我一人頭上。那時候，沒有人因我不會「家鄉話」而責怪、排斥我，反而人人欽羨我，以我的發音為榜樣，對着我苦練他們的「京腔」，所以，我仍然沒有任何學好鄉音的機會。

在桃農給我啓蒙，影響最大的幾位業師，如彭家瑞校長、張慶林老師、李國良老師及趙孝風老師等，他們都是來自大陸的師長，對我這似「

半山」青少年返鄉所面臨的心理適應狀況十分體諒瞭解，格外照顧，令我永銘於心。而兩位最讓我喜愛的音樂老師：孫少茹女士及史惟亮先生，都因癌症而英年早逝，我對他們在臺灣音樂教育上的貢獻，有欽敬的悼念。

多年來，很多初見面的朋友，發現我這個道地的「老臺」，却不太會講臺灣話，感到詫異，甚至有點懷疑我是「冒籍」。不過，瞭解我成長過程中的語言教育環境後，就該不至於責備我的不諳鄉語是「數典忘祖」了。世伯謝求生（東閩）先生，六十年前與先君同時負笈廣州中山大學，是當地唯二的兩個臺灣青年，相依維生，共度艱困，曾有饑餓時同飲白開水、分享一點乾糧的大段窮厄回憶，具深厚的同窗、同室及同鄉之誼；曾在數個賓客如雲的場合中，公開了我臺灣省嘉義人的「秘密」，使得在座眾師友驚訝不已。而我身份證上的籍貫欄，因早年先父就讀中山大學時臺灣正淪於日人掌握，若是不改籍廣東，便要自承為日本人（當時之臺灣人，一律被視做日人），而先父是一位日語流利却絕不肯當日日本人的死硬派，於是我也自幼隨着父親成為「廣東中山」籍，直到現在。

在我那較異於常人的成長過程中接受的語文教育環境，不但使我成為完全以「國語」為本本的中國人，也令我自幼便萌發一個心願，要把這人類最優美的語言，傳習給全世界。而在我就讀當時稱「淡江英專」三年級那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開始了對此理想至今不肯停止的追求。

二、作為一個專業華語教師的求知過程與語言教學經驗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年），臺灣十一個基督教聯合會的外籍教會負責人，在臺北市昆明街基督教青年會，創立了「基督教語文學院」（Missionary Language Institute，即「中華語文研習所」TLI的前身），目的在使剛到臺灣的外籍傳教士能有一個適當的華語研習機構進修華語，以方便他們未來的傳教工作。當時我非常倖倖，得以一個英語系三年級學生，因能操着一口「京片子」而應徵獲取，正式踏進了「華語教學」這一行業的大門。

這所學校剛開辦時，只有每班約五、六名合計三十餘位外籍學生，平均年齡達五十歲；而六名老師中，我是最年輕的一個，只有二十二歲。在大家都毫無語言教學經驗的摸索狀況下，所憑藉的只不過是一本羅馬拼音的「中國語會話」（Conversational Chinese），面對着數名金髮碧眼來自北歐、美加不同地域、性格、程度的「老」學生，我必須靠自己實驗來覓求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初期的成果當然只有事倍功半，辛苦可想而知。

個人初期的華語教學經驗中，最應感謝一位美籍的語言學顧問謝嘉翹（Dr. George Shelley）博士，他不但協助我克服了語言教學的初步障礙，而且引導激發了我對語言學的研究興趣。

民國四十九年，我服完預備軍官役後，重回T L I任教，其時學校已聘請謝磊翹博士為語言學顧問，負責指導教師們在語言教學法上的改進工作。謝先生的授課方式是每次由他先提供我英文原版的語言學書籍回家研讀，然後經過我與他詳盡的研討後，我便先在自己的課室裏引用試教，而謝先生就坐在我的課室中以筆記快速印證每一個教學理論的應用情況，然後利用每個星期六上午四個小時，集合學校全體教師，由謝先生以英文主講語言教學的理論與應用，我再以中文即席口譯協助授課，教師們同時提出各種語言教學上的個案問題，彼此切磋討論。經過如此周嚴的慎重處理，一套具體可行的華語教學法已見雛形，而我個人因實際參與作業流程，貢獻實習服務，受益也特為良多深入。

為了有效提昇教學品質，我更向校方建議並獲採納：一方面引進美國耶魯大學全套中文教材予以改編；同時動員資深華語教師編撰各級華語補充教材並製作錄音帶。現在回想當時此項重大決定：T L I之向美國耶魯大學引進中文教材，實在是自由中國華語教學的一項「拓荒」工作，因為後來，以至而今的海內外華語文教學上普遍採用的耶魯式羅馬拼音教材，包括T L I兩度為政府主編的「中國語文」全套（每套計十二冊）教材，都是由此基礎所成就的果實。而不斷整理編訂合宜的華語文教材，也從此成為我一生的一份內「工作」。事實上，我一直肯定——編訂理想的中國語文教材，是實現華文世界性教育絕不可或缺的條件。

民國五十一年，來華外籍留學生日增，而T L I董事會的全部外籍董事在各界籲請期盼下，終於同意學校更名為「臺北語文學院」，並向美國新澤西州辦理財團法人立案手續，開始接受非傳教士學生入學申請；而美國駐華大使館、美軍顧問團及臺灣協防司令部的主事者，均與T L I陸續簽訂委託代訓其官員及眷屬的華語文教學合約，我在T L I的工作，也由專任教師、語言學顧問助理、國語部主任再兼美國大使館華語部主任。是年七月，我在改制後的「淡江文理學院」補足學分，完成學士學位。民國五十二年，美國史丹福大學有意在臺灣成立中文研習所，希由T L I全權負責，但因人手不足，無法兼顧，而為當時之董事會否決，然T L I基於同行相持的道義情感，仍給予其開創時必需之助力，於是調派五員教師支援，在該所建立初期，分別擔任教務主任、錄音室主任及專任教師等職，成為史丹福語文中心的「開國元勳」。

民國五十三年，T L I租借浸信會教堂場地在臺中成立分校，我的行政工作負擔日益加重，由院長特別助理再調升為助理院長，使我的知識與能力同時受到更實際的考驗，也讓我深切體會到「學而後知不足」的真理。五十三年夏，我獲得美國布朗大學(University of Brown)語言學研究所贈予的全額助教獎學金，而夏威夷大學也同時延聘我為東亞研究系教職。為了提昇自己在語言學知識與教學上的實質，我不顧已有不輕的家庭負擔，放棄了夏大高薪的誘惑，堅持前往佈大進修。在佈大兩年間，我不但盡了最大的可

能，主修理論及應用語言學的課程，同時副修教育課程；五十四年夏，再前往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語言學研究所，攻讀了三門應用語言學的課程。五十五年夏，我完成了佈大語言學碩士學位，兼保有博士班候選人資格後，於七月返國正式接任「臺北語文學院」(T L I)院長。這是T L I創校以來，第十任，也是第一個中國人擔任院長。佈大的兩年進修歷程，我同時兼任該校中國語文講師，以增加我求學生活的經濟支持，這也成為一段非常值得的在語言課程、教材、教學法及語言實驗室的「學以致用」經驗。

當我接受了T L I負責人的職務，也真正面臨了一個完全需由自己獨撐處理的局面。在全體外籍董事充分授權下，我可以自由地發揮理想，也必須實無旁貸地應付一切現實——包括債務問題。首先，我決定把T L I過往以基督教傳教士為教學主要對象的禁網完全打開，讓T L I成為所有嚮往中華文化而志願修習中國語文者，不拘年齡、國籍、職業、宗教、膚色及種族，皆可自由申請入學的理想園地，以真正符合儒家「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在我接任院長以前，T L I雖然早已有限度的允許傳教士以外之外籍學生入學，但是教材的編訂、課程的安排及師資的標準，大都以配合教會傳教工作的需要為主；因此在教學內容與績效上受到極大的無形限制，顯然已不足順應世界對中國語文教學需要的潮流，當然也使T L I本身的生存受到嚴重影響，而我也就是在「救亡圖存」的局勢中，接下了這個燙手山

辛的。因此，我決心在課程、教師訓練、教材內容、錄音帶製作及文化研習上，必須作大幅度的革新，重起爐灶。

爲了使TLI此後的教材能配合學習華語（含國、臺、客語）者，一般性與特定目標的需要，我與TLI同仁們全心致力於編訂最現代、生活及趣味化的初級語文入門課本，並延伸到囊括中華歷史文化介紹的中高級教材，同時接受教育部委託主編「中國語文」，分初、中、高三級各貳冊；加上教師指引共十二大巨冊，包括錄音帶及每課拍成廿分鐘十六厘米的電影教學法，是爲世界性中文教學影片之創舉。其他如編訂聖經大辭典、閩南語辭典、閩南語及客語各級各類教材與輔助教材、教具、錄音帶及錄影帶的製作等，都是爲着適應未來華語教學課程的多元性發展和需要，屬於相當具有前瞻性的工作。

爲了使TLI教學水準能日益提升，我要求教學同仁與儘量力求自我充實，鼓勵同仁利用夜間，或暑期進修深造，並於週末上午定期作「語言教學與學的方法講習研討」，以強化教師所需專業知識及品質。每年也定期公開舉辦「華語師資訓練班」，招收有志從事華語教學、大專以上畢業青年予以密集專業訓練，選取優秀具潛能者作儲備師資，以充實我們的實力。

對於TLI的外籍學生方面，則成立了「學生輔導處」，指定專人負責，真誠給予學生生活情緒上的輔導與幫忙，像代爲安排居住中國家庭、提供各類服務，並對有志從事外語教學工作的學生們，義務訓練「外語教學法」，增加他們在

各語言補習班就業機會，來補助他們學習華語及生活費用等。爲了讓外籍學生能由學習中國語文而得入中華文化的門徑，得識精緻文化高層面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TLI特設「文化中心」，爲外籍學生開設各種文化課程，安排文化參觀及訪問活動。課業方面例有：中國文化特質、特殊儀禮（如傳統的五倫關係）、功夫、書法、國畫、裱糊、烹飪、插花藝術、中國結、針灸等。而爲配合我國的各種節令與慶典而舉辦的活動就更多采多姿，如春節禮俗（每年舉辦「帶老外回家過年」活動）、元宵猜謎觀燈、端午節龍舟競渡（於臺北、高雄兩地分別組成「中華語文研習所龍舟隊」參與國際組及社會組比賽）、中元普渡、中秋賞月、祭孔大典、國慶閱兵等，無一錯過。單元性的專題演講與參觀訪問則更不勝枚舉：中國茶藝介紹、陶藝欣賞、古蹟歷覽、宗教寺廟神秘面貌、中國哲學思想入門、中文報刊印刷實際作業參觀、議會市政總質詢旁聽、環島名勝旅遊、中國喪葬禮俗與中國婚禮實地觀察、中國戲曲欣賞講解等，也時時舉辦。

TLI主辦這種種文化活動，是採取對外開放的，凡在臺灣的外籍人士與海外華僑都歡迎自由參加，目的希望藉着一系列的文化介紹、參觀訪問、旅遊欣賞，使外籍學生不僅積極參與中國人的真實生活，引發他們對中國的風俗習慣、文化取向與社會實況有深入體悟、認同了解，而且幫助他們學習中文能生活化、藝術化、行動化。我始終認爲語言是體認文化的第一塊敲門磚，我們的華語教學，必須延伸至中華文化豐富的內涵

中，才具有踏實的意義與價值。

在TLI的教學觀念上，我有一些堅信不移的理念，要求全體師生予以共識。TLI的語言教學系統，依下列三部份組織：（一）教學目標：按學生的志願及學習目的（如外交、新聞、工商、傳教、軍事或中國研究等），分近、中、長程計劃，訂定不同課程。自中程起，即由一般課程漸入專業課程。（二）教材與教學方法：爲達成上列不同的目標，TLI特分設「教材及教具製作部」、「視聽中心」及「教師研習會」，由本所「語言教學顧問會」分別指導所屬同仁在各類專業及補充教材上時刻編訂與修正；錄音帶與錄影帶的不斷更新製作及每週四個教學中心分別集合全體教師舉行「教學問題及方法研討會」，充份交換教學心得，強化教師專業知識，並經常與國內外各大學中文系所或語文機構聯繫，提供優良師資，以收互切互磋、日新又新之效。TLI更召集志願學生不定期舉辦「語文學習研討會」，解決學生學習上的各項難題及心理適應，因此使得「TLI教學法」普遍爲學生所歡迎而績效顯著，於國際上聲名遠播，受到充份肯定。（三）教學評鑑方法：每一學科依課程性質，均以科學的語言測驗方法，設計出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巧，不同程度的試題（包括隨堂測驗、週考、期中考及期末考），以評鑑各類教材是否符合課程標準，從學生的考試成績測出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有無達到教學目標及要求水準？同時，不定期的學生「問卷調查」，也促進了教師們不斷的自我省察。多年來，TLI造就了不知凡幾享譽海內

外的傑出「中國通」。總之，T L I 的教學理念是以「教學目標」來領導「教學方法」及「考試評鑑」，而臺灣三十餘載以來的「大專聯考制度」，却是鼓勵用「考試」來領導「教學目標及方法」，這種本來顛倒的教育措施，實應徹底研究改進。

T L I 於三十年前即獨創的五人小班制教學，強調口語練習，使學生於課堂內有充份受教和練習的機會，影響了國內繼起各公私立語文機構紛紛效法。而我於二十年前接任 T L I 院長後，在一系列的「T L I 語言教學法」討論會中強調之「對比分析的教學功能」——包括兩種語音、語法、字彙及文化的對比分析法（見拙作「談語音及語言教學」，一九六六年七月臺北語文學院教學研究會諸稿，見「思與言」雜誌八卷二期），沒想到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我所出席的下列國際性有關漢語教學的討論會中，仍為大多數與會人士肯定為有效的教學原則：①一九六八年四月於印度德里大學之「中文教學研討會」。②一九七五年七月及一九七六年七月分別於臺北舉行的國建會語文組（本人榮召集人）。③一九七五年九月於漢城舉行的「第四屆亞洲教授國際會議」。④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度分別於舊金山及華盛頓舉行的「中國語文教材編輯座談會」。⑤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舊金山舉行的「華美經濟及科技發展研討會」。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於臺北舉行的「第一屆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⑦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於紐約市舉行的「全美中文教師年會研討會」。^⑧一九八六年六月於東

京國際學院舉行的「中國語教師養成講座」。而被認定「對比分析對語言教學的貢獻已是不爭的事實。」（引用屈永新教授講評，見第一屆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一〇九頁）由此可知，一個具前瞻性的語文教學決策者對其主持機構的發展方向及其影響是無遠弗屆的。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至五十七年七月，我應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之聘，擔任該會中國研究顧問（Consultant on Chinese Studies），出任印度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Delhi）客座教授，在印一年除協助德里大學創立了中國研究系，釐定該系的語言文化及中國問題研究課程，培養當地華語教師師資、講授中國語言學，並遴選印籍研究生分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臺北語文學院（T L I）研習中文。我同時在德里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班進修印地語（Hindi），研讀並積極蒐集論文資料，終於一九七六年以「中印語音對比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Mandarin and Hindi Sound Systems）書完成博士學位。

在我離臺赴印前，中國青年 X X 救國團與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數度邀我洽談合辦「海外青年暑期返國研習營」一事，鑑於這是一項關係僑心歸向且極具民族意識的教育任務，在責無旁貸、舍我其誰的當時環境下，也只有毅然決然挑下了這個擔子。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我動員了 T L I 大批同仁，編寫了融入中國文化、倫理及民族意義的各級生活趣味化會話與讀本教材，並慎選 T L I 優良盡責、兼具愛心與服務熱忱教師十餘人，

予以授課前之海外僑情、中國文化及愛國思想加強訓練，力派往施教，果然達到預期效果。這項暑期密集教育華僑子弟中國語文的工作，因為反應良好、績效斐然，自第一期的一百餘名學生，陸續增加到每期四百多名。有一年在蔣經國先生訪美時，經不起各地僑胞一再懇求，他竟一口答應此營當年夏天准予破例增加學生到六百名，使得救國團各級主管們著實大費周章，因為這不僅牽涉到太平洋兩岸的交通，而且學生僑居所在也包括了歐洲大陸及全美各地，各個僑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安全問題，乃至環遊全島時的交通及住宿問題，樣樣都需克服。T L I 忠實地配合著救國團的任務，一連持續了十五年，讓六千餘僑居異國的炎黃子弟，有機會認識了中國文化，尋到了他們的根源，對 T L I 全體同仁來說，是一項光榮與豐碩的精神收穫。

我深知自己在浩瀚的語言學領域中，只是渺小的一个基層份子，默默貢獻一點心力。正因為如此，我要求自己與 T L I 的同仁在教學時，必須做到真誠敬業，務必全心一意投入自己的工作，由親身的經驗中，去覓求教學知識與成果的不斷自我精進。因此我可以放心的說：T L I 華語教學的成員，在任何時空，都無愧為一個盡心稱職的華語教師，而這也正是我一生全力以赴的方向。

三、三十年華語教學生活的甘苦得失

我國自古有「三十年成一世」的說法，回首

前塵，自己由一個英語系三年級的學生，投身華語教學行列，而成為專業者，一見竟滿三十年了。這一世所經歷的人生滋味，當然也是寒夜飲水，點滴自知。在我致力於TLI辛勤耕耘的三十年中，濫竽充數人就有二十年，所做些份內的工作，或可向國家社會，與有望於我的長輩師友稍作交待。TLI這些年來致力追求的理想，其績效大約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 語文教材的編訂

在TLI語言學顧問及資深同仁的通力合作下，我們先後編訂了中國語文、閩南語、客家話教材、閩南語大辭典，各類專題會話、讀本及語言學論述等達百種以上（見TLI書目）。其中「中國語文」一套（共十二冊，正中書局出版），是TLI於民國六十九年應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之請，由我本人負責主編，這套教材是我們考究當時海外華語教學的利弊與實際需要而編訂的，也是中華民國為海外人士出版的第一套自初級、中級而高級，集會話與讀本，慎選常用字彙由淺而深的完整教材。出版後即受到海內外華語教學界的普遍重視，再版達八次之多，銷售海外近兩萬冊，目前已被歐美各大學採用者有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愛荷華州布那威士達大學、法國巴黎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日本格林學院等數十所。「中國語文」並經TLI視聽中心與教育部、光啓社合作，拍成十六厘米電影教學片及錄影帶，於一九八〇年在美國舊金山海華電視台推出中文教學節目，全年播出，極獲好評。「閩南語會話」

一套三冊及「閩南語大辭典」，則為美國康乃爾等十七所大學所採用。其他教材，包括教學錄音帶、錄影帶及各種教具等一百五十種，更普遍為國內外華語中心所採用。TLI歷時十年編輯出版的「閩南語英語大辭典」，先後在香港、臺北兩地出版，已被歐美日各國會及大學圖書館收藏與普遍利用。

以上舉例略述，只是說明TLI同仁對華語教學工作的默默耕耘，無論成績大小，一定要繼續不斷的做下去。

(二) 教學工作的推廣

自我個人投身TLI的三十年間，TLI已由一個為訓練基督傳教士而設置的華語中心，經香港標準報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轉載美國太陽報消息及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六日英文中國日報報導，成為世界十大語言學校之一。TLI培養的外籍學生，至今已超過八萬人，包括各國駐華使節、外交官員、學術、教育、新聞、工商、宗教各界的領袖及知名人士。

其中較著名者如：即將由美來臺主持美國在臺協會的丁大衛先生，前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父子，美國現任駐新加坡大使丙克儉，前駐韓大使、副助理國務卿來天惠，曾任美國外交學院中文部主任、現任AIT華語學校校長的顧百里博士等等，都是TLI傑出的外籍學生。

而我個人也有幸親自教授過前美國駐華代辦（副館長代理大使）現任名滿國際的華府布魯克林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高立夫先生，及美國中國政

策制定人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遠東研究所所長韋慕庭博士與夫人，他們都分別於一九六二至六四全年在TLI上課，而韋氏且於一九七七年秋，再度來TLI研習中文。高、韋二氏的談吐風度與氣質都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猶堪引以為慰者，新加坡四海大學董事長瑞斯博士，於一九七七年三月至九月在本所研習中文時，已年屆六十，特自動撰文讚譽TLI的華語教學成就，聲稱如果十二年前就知道TLI研習中文的功效如此卓著，他們夫婦將不會在美國其他學校虛擲一年光陰。

自民國五十一（一九六二）年至六十八（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止，我曾代表TLI與美國國務院簽約，負責美國駐華官員及眷屬在臺北與高雄兩地之華語文訓練，包括美國歷任駐華大使、美軍顧問團團長及美軍協防司令等。至如其他各國：澳洲駐華大使館、日本駐華大使館、南非駐華大使館、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大使館、海地駐華大使館、巴拉圭駐華大使館等官員，以及日本三菱、三井、住友、丸紅等大商社高級主管、幹部均在TLI研習中文，為各國政府和貿易組織培養了真正實用的中文人才。

當前美國政府，民間團體及日本各大商社派往中國大陸的外交官或貿易要員，TLI的學生佔有極高比率。

在協助海外的華語教學工作方面，個人除在民國五十六年協助印度政府創辦德里大學中國研究系外，並於民國六十年十月應香港基督教聯合會之邀，在九龍創辦「香港語文學院」，分設國

、粵語二部。十五年來，在該校研習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外籍傳教士、工商領袖、外交官及當地人士至少二千人。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T L I 向教育部報備核准在美國舊金山聯合當地人士創設「中山文化學院」，向美西全力推動華文教育與宣揚中華文化，並購買舊金山海華電視台全年時段，於每週一晚，由我本人親自對舊金山灣區，播出「中國語文電視教學」節目，收視的外籍人士及華僑子弟無數。其中一位電視觀眾馬空先生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來函提出三點：「一、這個節目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優良課程。二、我及朋友們現正利用這個電視教學節目學習華語且進步神速。三、我曾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使用中共教材，可惜他們的教材無論在解釋的條理與內容及練習的安排上，都比不上你們。」以上說明，雖不能以績效自詡，但至少為全世界中文電視教學的創舉。中共後來也跟進在日本 NHK 電視台推出華語教學節目，但除 T L I 外至今尚無第二人在美國市場上推出類似節目。

民國七十年起，我為協助美國愛荷華州布威士達學院 (Buena Vista College) 創辦中文系，除了前後安排 T L I 中文教師四位前往主持教學，並為該校廿餘名學生籌募獎學金來華研習中文。該校校長白士可博士夫婦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廿一日親自來台頒贈「校長榮譽獎」。證書說明：「『校長榮譽獎』為布大校長最高榮譽，何景賢博士是本校創辦九十一年來第五位獲得是項榮譽人士，獲得原因為『增進國際瞭解』——贈

予一位為中華民國政府無私奉獻予本校計劃的明智之士。」在場觀禮有郭為藩、楊其銑、鮑幼玉、毛高文等諸兄嫂。

以上種種，都屬 T L I 和我個人卅年內點滴所做努力，聊盡一個華語教學者的本份。

(三) 華語教學師資的培育

華語教學師資的培育，是我二十年來個人致力最鉅的工作。由於我對 T L I 教學同仁在職訓練要求嚴格，並以 T L I 的力量支持鼓勵老師進修深造，故於國內外有多所知名學府提供獎學金，延聘 T L I 的師資擔任助教、攻讀博士學位，負責華語教學工作或主持中文系務，前後已達三百餘位。而經 T L I 培育的華語師資（包括中外教員）人數亦在兩千人以上。

其中卓然有成、享譽海外者，如美國史丹佛大學高恭億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芝加哥大學趙智超教授、康乃爾大學施璧倫教授、威斯康遜大學陳廣才教授、華盛頓大學陳恩綺教授與黃廣慶教授、夏威夷大學賀上賢教授、惠提亞大學外文系主任王孝敏教授、美國國防語學院武學平教授、西東大學林雲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李于春華教授和戴宜春教授等，都算具代表性者。此種具體事實顯示：T L I 的華語教學師資培育，已有了落實的世界性種子，未來將會有更多、更令人期待的突破性發展，在同仁們的齊心努力下橫跨全球。

T L I 的成就，無論大小，終是讓人欣慰的；T L I 的維繫生存却也自有一番可慨嘆的「人

事」滄桑。由於 T L I 是一個完全以民間力量來從事語文教學工作的公益機構，自創辦起，從不曾擁有任何外力經濟支持。我接手時的 T L I，已是虧負累累，難以為繼，遑論鴻圖大展？但當時的我年事尚輕，全憑熱情理想做事，認定 T L I 絕對有前途，所以毫不考慮後果，將整付重擔肩承下來，再由種種挫折、失敗教訓中，覓求生存體験。

個人天性本以教學與研究為生活理想，但自接掌 T L I 校長，就不得不把大部份精神時間挪付給人事、行政、財務、公關、社會服務等雜項上，解決些錯綜複雜、層出不窮、想像不到的問題，很難無牽無掛、從心所欲，做自己真心想做的研究工作。二十年來 T L I 的社會表現，不時獲得人們的掌聲與喝采，卻沒有幾人能瞭解，換得那掌聲與喝采的真正代價乃是個人滿腹辛酸與真正無我無私的赤誠奉獻犧牲。T L I 固已獲得社會與世界性獎譽與肯定，但 T L I 遭受的難題永遠仍必須自謀解決，沒有人靠，也絕不靠人。個人二十年來，曾有幸多次代表政府、有關社團及學校，出席國際會議，或擔任文化講座，或發表論文，或主持學術討論，雖不能說都「載譽而歸」，總算「幸不辱命」。而幾乎每次都是一俟「任務」告成，或會議結束，即馬不停蹄，匆匆趕回臺灣，料理 T L I 亟待我親自解決的問題，因為我永遠沒有「公假」來「出公差」，我是擱置下自己的事業去「因公廢私」，每離開崗位一天，T L I 就有一天失去領導人，可能發生任何「危機」。

民國六十五年二月，我應教育部徵召，擔任中華民國綜藝團領隊，率領集全臺灣綜藝特技人才計英共六十五人團體，三次集訓、四度出國，先後分訪香港、馬來西亞、加拿大各地宏揚中華文化並宣慰僑胞，亦為慶賀美國立國二百週年，在全美近四十州作巡迴演出，以增進國際友誼，前後歷時十一個月之久，公演達兩百五十場，吸引國際友人與僑胞前往觀賞約五十萬人，並在紐約市美善（MACY）公司成立五十週年慶的露天電視節目中，將我中華民族一流的綜藝特技，陳現於北美地區一億以上的電視觀眾前，所得反應及報導，真是佳評如潮。然而，當我於六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深夜，帶領全團真正載譽而返，準備接受廿四日中午教育部長的慶功宴時，

上圖：作者（中）與中華語文研習所同學合影。下圖：美故總統甘迺迪之外甥（右）來臺研習中文，在一項遊園會中作者（左）介紹其首見謝前副總統與李煥部長時攝影。



廿四日上午九時迎接着我的却是一場稅務官司。在我率綜藝團離臺期間，有人匿名向國稅局檢舉T.L.I.漏稅，由於負責人身在國外，國稅局將案子移送法院。我萬萬沒料想到，為國家奔走終年，一下飛機的我竟然必須忙的是整理資料、蒐集證據、撰寫訴狀、出庭答辯。經過一年多訴訟，T.L.I.總算因確未犯法，沒有逃稅的事實而勝訴。但T.L.I.從此却成了稅務機構「瞞目」的對象，年年報稅時受到「特別照顧」，不知道這是否就算國家給我的回報？或是我「不務正業」（擔任中華民國史無前例，長達十一個月的綜藝團領隊）所應得的「報應」？！

「華語教學」委實不是一種足以「營利」的生產事業，而是一種高品質服務性的教育文化工作。

作。所有T.L.I.的同仁與我都在杯水車薪中為了理想與興趣而做執著的傻子。我們的每一個洋學生都是「一對一」式要求百分之百、正確又迅速地學會、學通中文而後已。而他們所交的每一文錢學費，也都得立時回流到師資、教材與龐大的租金、水電、各項軟體建設、文化活動等大環境中去。五年前，眼見享譽不差的新竹天主教華語學校終因「覺悟」而關閉，我面對着無數知友好意遊說：「為何不開一家考大學的文理補習班呢？或是留學托福班？每班百人，填鴨一番即可解決T.L.I.的債務。」他們的善意，令我感動，但既已做了執著的傻子，此生已無法回頭矣。T.L.I.在我接掌後廿年中，在中華民國境內，先後成立臺中、高雄、臺東、臺北、士林等五個教學中心，在「以償養債」的壓力下，勉力於臺中市北屯購選校地五百五十坪，建立了永久校舍。

結語

T.L.I.三十年的奮鬥與成長，帶給我的負擔重似千鈞。人事困擾、財務壓力、以及種種來自稅務機構想像不到的意外難題，有時真讓人技窮力細、身心交疲，感到陣陣職業倦怠，盼能撒身事外，略息仔肩。但每當我念及T.L.I.始終在茁壯的涓滴成果，正是同仁們辛勞與心血之共同收穫；T.L.I.的教學業績、社會表現為世人如此慎重認可，豈非自己生平最大的心願：「以教授中文為方法，宏揚文化為目的，求中華香火之薪傳，達世界大同之理想」，已被肯定之明證？何況T.L.I.的工作對我們的社會存在着文化外交的真實意義，豈能讓自己氣餒認輸作逃兵呢？我確信T.L.I.會在國家與社會的精神支持下，繼續追尋華語教學領域中更崇高的標準。（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臺北）

漫談我國的文字與方言

安·可·仰

猶憶在對日抗戰時期，我經過大陸東南各省的縣份甚至村落，幾乎每天在數小時行程中，就感覺到沿途居民的語言隨地而異。我是一個喜於研究方言的人；但是遇到相隔十餘里即語言互異的地方，就莫明其閉塞的緣故！

人爲的不肯同化

茲先就江蘇省而言，鎮江與丹陽、靖江與南通，同在江蘇，同為鄰縣，何況鎮江、丹陽間之快車只須三十餘分鐘；靖江與南通更是一片平原，談不到阻隔。而方言則各不相同，甚至彼此聽不懂。可見這不盡是天然分界，而是人爲的過於不肯同化。因此，何怪閩粵兩省，每縣來往如同異國。昔見福建興化與福州的同學，互以官話或英語相談。我曾詢問：何以不用鄉音？答稱：我們如操鄉音，其不懂與外省無異。方知中國語言之複雜。

文字統一功效大

中國語言雖極其龐雜，而十多億人（指現在的人口）可以團結成一個國家，經數千年之久，並不須加以強制者，其唯一依賴之工具，則為文字。在昔中國以讀書人為四民之首，科舉學校，文字一致；語言雖異，筆談則同。紅樓夢與三國

演義為中國兩部名小說，而曹雪芹與羅貫中兩位作者天南地北，假令彼此見面，可斷言其一語不通。故中國統一的精神所繫，實為文字統一的功效，是為何人與任何時代所不能否認者。

天不變文亦不變

我當年會到過中共早期根據地江西瑞金，時城內已成廢墟，獨文廟的牌坊「道冠古今」四字與如今台灣的孔廟的石額相同，可知中國文化之價值應在「天不變文亦不變」之列。因此，又想起孔子「書同文，車同軌」的大同理想。以數千年交通閉塞之國家，而能文字相通，則孔子提倡「書同文」之功效，確不可磨滅。

中國文字，在世界文字羣中，其不遭淘汰，自有其獨到之處。吾人實不能數典忘祖，而自棄其珍寶。

自成形象偏旁多

然而中國文字，究有無缺點，吾人更不可不

知。

中國文字各有定形，自成形象。兒童讀書，先要費去許多腦力，認識字形。近年雖有若干新的「檢字法」，終以偏旁太多，歸納不出一百字以內的字母，致字典的分類，仍脫不了「康熙字典」不合理的部首。即使文字通順的人，往往數十分鐘亦查不出數字。

例如：幸字從干，而報字從土，問字不從門而從口，羅字不從系佳而從四，諸如此類，遂使學者難以檢查。

打字排字太煩難

又以筆劃雖有多寡，而字體則須大小一律。雖在另一方面以藝術眼光視之，中國文字之美，就其參差不一。但為打字、排字減少字母起見，既不能將謝字分為言身寸三個字；也不能將意字改為立日心三個字。所以印刷鑄字至少非數千字體不能排版。而工作因字架之地位與學習之時間，其難易煩瑣，較之西文字母，殆有百比一之差。現在雖已有人發明了中文打字機甚至中文電

腦之類，但因字形過於複雜，始終未臻於完美之境！

漢字無人能消滅

中國文字因有以上種種缺點，影响到文化普及的速度，故中國文字始終停頓在貴族化、藝術化之境界，尙不能盡普及大眾教育之功用。

但是這些缺點，不是無法補救的。以中國版圖如此之大，元清兩代異族統治中國雖皆為時很長，且皆曾挾其本族文字以俱來，而結果元清文字皆自形淘汰，同化於漢字。此即中國文字特立獨行精神所在。日本利用假片名代替漢字，至今仍不能消滅漢字。

不特此也，不但中國楷書不會消滅，即中國之「篆書」、「鐘鼎」，儼如圖畫之古字，自有愛好者在，亦不會滅絕。所以，中國字形應保存其獨立，讀音則有統一之必要。

註音字母被忽視

國音字母，原是一副最簡單化、最易普及中國文化的唯一利器。可惜國人多以其太易認識而不予重視，或以其發音拘束而加以排斥。雖曾定為小學生必讀之國音符號，終變為文字上的贅瘤，徒供人視為可有可無之類。

讀書成熟者視註音字母為累贅。但我們為識字不多的大家設想，他們除了一二三四五幾個字可以勉強認識而外，幾乎兩眼漆黑，不但不能讀文藝作品，並且不能讀普通書籍。我們中國新聞

紙所以銷行量不能與美英報紙看齊，這不僅經濟上不夠條件，大半是能讀報的人太少。這種不能普及教育的責任，不在文字的本身，又不在求智識者之不努力，而是在負有供給大眾教育者之不善利用註音符號的過失。

幸有文字可通行

我們初到台灣時，初以為台灣同胞受了日本統治五十年的遺毒，一定一切人情風俗，皆是東洋化。詎知一經考察後，不但生活習慣，仍保持內地的風俗，尤可驚者，中國文字仍未被它假名消滅。家家戶戶門首春聯詞句，猶保持「又是一年芳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之中華民族樂天的古風。因此，我感覺日本五十年來同化台胞之所以失敗，不能不歸功於漢文。所以異族統治中國，可以亡國，而不能亡族。唯最感缺憾者，為流行於台胞中之閩南方言，外省人不但無法學習，且無法聽懂。但幸有文字尙可通行。然欲外省人到台灣如歸故鄉，本地人視外來者如家人重逢，則台灣語言之一元化，當較大陸各省更為迫切。到了卅餘年後的今日，台灣的若干山地人，已有許多能講普通話，總算比大陸的進步為快。這是為全國與台灣團結之紐繫，並非為片面之便利而強人同化也。

中國漢字，以固定形體，而收統一國家之功效；中國國音，是以同一音調，而獲致團結國人情感之津梁。因國音能補漢字之缺點，輔助教育

之普及，絕非奪漢字獨立以成拼字之文字。吾人不能忘記：統一文字，是我們祖先的奇蹟；統一國音，則是我們後代的責任。

（原載：春秋雜誌「台」一九八六年

七〇七期三四—三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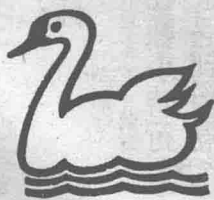
（上接第二二頁）

時，如果不掺杂國語，就無法表達完整的意思；正式發表演講時，就非採用國語不可了。只有別有居心的人妄倡使用「臺灣話」，實在顯得很幼稚。

大點說來，國語和方言的關係，為一般與特殊的關係；方言融入國語，就更為洗練而文雅；讓國語多加包容方言，內容也會更加豐富。

（原載：福建雜誌「台」一九八六年

二二期五三—五六頁）



爲閩南語正名

林衡道

時下，有些別有居心的人漫天叫嚷，妄倡使用「臺灣話」，其實，在背地被人嗤之爲「癡人之夢」，他們自己還不自知。

我們中國人的語言屬於漢藏語系，而漢藏語系乃是我們自己訂的學名，國際上叫做東南亞語系。

漢藏語系所分布的地方，包括了西藏在內的我國本土、中南半島，以及現在的泰國。這個語系的特色，原則上，不論名詞或動詞，都是單音節。比如：名詞的天、地、水、人、動詞的食、住、行、臥，無一不是單音節。

近鄰的阿爾泰民族，像韓國人、日本人，他們的語言就不同了，名詞、動詞都是粘着語，也就是說，好幾個音節粘在一起。

古時候，我們的祖先住在長江以北，特別集中在黃河流域。當時的長江以南，像吳國、楚國的語言，都有兩音節的情況。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國，虎叫做「於菟」，辭源也有這樣的記載。

自從五胡亂華以後，原住在長江以北的若干支，南遷過焦嶺，來到今天的粵東、閩南定居，這就是所謂客家的來源。從此之後，每次中原遇有戰亂的時候，都有人過焦嶺南遷，客家不斷擴充，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後，中原的衣冠之家遷居嶺南的人特別多，而使得客家的人口益見增加。

如今，住在臺灣的客家多爲閩南、粵東的客家，係在明末清初以來，不斷移居臺灣而形成。所以，無

論大陸或臺灣地區，客家的語言保留很多我國古代語言的音韻，便是這個因素。

其次，當五胡亂華，客家源源不斷地遷往閩南定居的時候，福建仍爲閩越的種族所居住，有關福建的中原化，是在唐代才開始的。

提到閩越種族，亦即所謂的古代無諸的無裔。唐代，漳、泉方面因陳元光平定當地的土著，而推行中原化，福州方面有節度使王審知，自稱爲閩王，也推動中原化的工作。

因爲福建的周圍都是高山，與大陸其他地方完全隔絕，所以福建的方言，無論漳泉或福州的方言，也是保留很多古代語言的音韻。這一點，跟粵東客家話的情形是一樣的。並且到現在，福建的方言仍有兩個音節的言語用法，像玩，國語只有一個音節，漳泉方言叫做逗逗，福州方言叫做脚溜；另如巖（岩），福州方言叫做林潭，均爲兩個音節。

舉例來說，我們中國北方的語言本來有八聲，五胡亂華以後，因爲胡人對八聲很拗口，不是發音發不出來，就是很不流利。慢慢地，漢人跟胡人互相作交流之後，變成只講四聲。今天，我們的國語只有四聲，就是由此演變而來。

相反的，客家話，乃至漳泉、福州的方言，都有八聲，古代語言的豐富音韻反在南方保留著，不無「禮失求諸野」的道理。

此外，在古代，我們的祖先所用的語言，K的音

很多，但因胡人不會發K的音，以致所有K的音變成G，就像街本來唸^{an}現在唸成^{an}，而在客家話及漳泉、福州的方言，仍然保留K的音。

我們古代的語言當中，H的音很多，胡人不會唸，而把H唸成F。因此，北方話只有F的音，卻沒有H的音。國語也是如此，福氣的福字，國語唸做^{fo}，漳泉、福州的方言還是唸^{hok}，仍舊保留古音。

不妨這麼說，古時候的胡人發音就像幼稚園的小朋友一樣，老是唸走了音，百事可樂不會唸，而唸成百事可悅。

接著來看福建省的方言分布情況，以漳泉方言的流通範圍最為廣大，福州方言流通十一個縣市而已，人口還不到兩百萬；閩北方言和江西方言很像，使用閩北方言的人很少；閩西的汀州府則使用汀州的客家話，使用人口也不多。合計起來，閩北方言和汀州客家話的使用人口比福州方言更少，最多的是漳泉方言。

所以，漳泉方言有福建話之稱，它的使用人口不但在福建的分布地區最廣，海外華僑也廣泛流通，把它稱為福建話，用文言來說，就是閩語，實在是當之無愧。

但是，也有人為了跟福建省會福州的方言加以區別，而把漳泉方言叫做閩南話，文言稱為閩南語。

福州既然是福建的省會，自古以來，福州人以居天下的中央而自許，並將漳泉方言稱做「下府話」或者「下路話」；以福州為中心，閩北的延平、建甌為上府，又叫做上路，相對的，閩南的漳泉就是下府、下路。

清代時期，臺灣曾經是福建省的一個府，所以那時候，臺灣也是屬於下府、下路。

到了清末五口通商之後，漳泉兩府的人無論渡海

到南洋去，或是和外國人通商交易，均以廈門為根據地，因此，外國人把漳泉方言叫做廈門話。

在清代的臺灣同胞，大家只有我是漳州人，你是泉州人，他是廣東嘉應州的人……等等的說法，而沒有自稱是臺灣人。

官府的文件，往往寫臺灣人某某、淡水人某某，那是因為臺灣有很長一段時間，分為臺灣府和淡水廳兩個行政區，以大甲的大安溪為界，溪的南部屬於臺灣府，府治設在今臺南市，溪的北部屬於淡水廳，廳治設在今新竹市。

在官方的文告出現這種臺灣人、淡水人的字眼，係指臺灣府的人、淡水廳的人而言，跟今天別有居心的人所講的臺灣人，意思完全不同。

至於今天別有居心的人所講的「臺灣人」一詞，乃是日據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分化中華民族而製造出來的用詞。

而且，在清代，臺灣根本沒有臺灣話這樣的說法。那個時候，只說那個人講的是漳州腔、這個人講的是客家話……等等，而沒有人說那個人講的是臺灣話。

由此可見，目前我們的政府機關，乃至大眾傳播事業，在提到有關臺灣的方言時，都不採用臺灣話的字眼，而以閩南語、客家話等地方上的方言來稱呼，這是對的，也才是正確的用法。

另外，新加坡的人口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使用漳泉方言，也就是所謂閩南話。但是，新加坡的政府及學術界都重視華語，亦即我們的國語，他們並不主張推廣方言，便是因為國語是文言一致，其他各種方言都無這一優點。

時至今日，臺灣同胞四十歲以下的人以方言交談

閩南方言之典

「綜合閩南方言基本字典」之小徵

閩南方言，是在本地使用最多的中國方言，大部分說得一口流利閩南方言的人，可能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近，有不少學者專家致力於研究閩南方言，或台灣語，逐漸受到語言學家的重視，其主因是閩南方言保存了極有價值的我國古語。

目前旅居美國的前台大中文系教授吳守禮，自一九七三年退休之後，即全心致力於研究編纂「綜合閩南方言基本字典」，歷經十餘年終於完成，全書厚達一千五百頁，近日剛剛印妥第一冊「緒言」，全書可望年底問世，由林維源先生紀念基金援助研究出版。

「緒言」一冊的內容包括「閩南方言過台灣」、「國語注音符號」到「閩南音閩號」溯源」、「

「國語注音符號」和「閩南音閩號」合表」、「閩南語聲調和記號」、「綜合閩南方言符號拼音總表」、「校理閩南方言資料示例」。

吳教授連用的文獻，包括早在中國本土佚亡失傳的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照相或底片；從海外搜尋的文獻；以及古今中外學者有關閩南方言的研究考證成果。綜合了這些文獻資料，他確定：閩南系台灣方言在故土（福建、閩南）以及在移入以來已經三百多年的台灣，深鄉僻處，還保存着漳、泉各系的特色，但是它的主流却逐漸呈現混合狀態，也就是說在廈門混合一次，渡來台灣再混合一次。

但是吳教授編「綜合閩南方言基本字典」時，却不採取中心地主義，而彙集次位方言，並在韻母、聲母上加註其漳、泉、廈的來源，兼收正音、正字、異音、異字。作者自稱為「百衲本」。

希望這部字典早日在台灣上市，讓有心了解閩南方言的人士，多一種工具書。

目次

一个华语教学者的自述	何景贤	一
漫谈我国的文字与方言	安可仰	九
为闽南语正名	林銮道	一一
闽南方言之典《综合闽南方言基本字典》	小薇	一三
读《现代语言学研究》，兼论王德春的语 言学观点	徐复 张拱贵	1
中学语法教学的依据：试谈《中学教学语 法系统提要》	田小琳	4
试将句子再分类	秦礼君	11
比喻象征和篇章修辞	程观林	16
读音语音与韵母音素探讨	冯长青	20
粤语语调初探	郭张凯伦 陆镜光	25
香港粤语的共时语音变化	包容舜	33
有关汉语“夏”字与藏语对汉族的称呼	黎邦洋	43
记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	林立	46

讀《現代語言學研究》

兼論王德春的語言學觀點

徐復* 張拱貴*

我們懷着十分喜悅的心情閱讀了王德春教授的《現代語言學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書。這本書觀點新穎、內容深廣、論述精湛，既有相當高的理論水平，又有很切實際的應用價值，為語言學論著中不可多得的好書。

王德春教授的學術理論一向為語言學界所稱道。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言語環境、言語規律、詞的界限、熟語的性質、修辭學的對象等理論觀點，贏得了國內外學者的讚譽。近幾年來，他發表一百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現代語言學研究》、《修辭學探索》、《詞匯學研究》、《語言學通論》、《語言學教程》、《語體略論》等多種語言學專著，主編了期刊、叢刊、叢書、詞典、論文集、教學參考書數十種。這些論著反映了現代語言學的最新成果，分析了當代語言學的發展趨勢，給讀者帶來新的科學信息。《現代語言學研究》就是他代表性的論著之一。

首先，談談觀點新穎。我國語言學界從五十年代起就討論語言和言語的區分問題。當時一些學者認為，語言和言語無須區分；另一些學者認為，語言和言語應加區分，但言語無規可循，區分的目的是為了研究純粹的語言。王德春先生當時獨樹一幟，他不僅肯定了語言和言語區分的必要性，而且認為言語是有規可循的，研究言語規律是現代語言學的重要任務。他在六十年代初發表的《語言學的新對象和新學科》（《文匯報》1962年3月1日）、《使用語言的環境》（《學術研究》1964年第5期）等論文曾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巨大反響。最近幾年，他把言語規律概括為與言語環境相適應的規律、選擇語言單位組成話語的規律和與交際目的相適應的規律，並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

王先生在語義形式化、言語變體、話語分析、言語生成、言語理解、語言掌握、語言和思維的相互作用、外語教學的基礎等方面也都有新穎獨到的見解，引人深思，引人探索。

其次，談談內容深廣。《現代語言學研究》一書涉及結構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工程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輔助語言學等領域的主要問題，對許多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深刻廣博的角度，為讀者勾勒了現代語言學發展的圖景。

以“心理語言學簡論”一篇為例，這篇“簡論”要言不繁，從心理語言學的產生、發展寫到八十年代的展望，凡重要問題，應有盡有，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內部言語的構成、

* 徐復先生，江蘇省語言學會名譽會長；張拱貴先生，南京市語言學會會長。